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轉型中的大陸地方政商關係：天橋區的個案研究 1979-2001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1-2414-H-004-061-

執行期間：91年08月01日至93年01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計畫主持人：耿曙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報告附件：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赴大陸地區研究心得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3 年 3 月 31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轉型中的大陸地方政商關係：天橋區的個案研究 1979-2001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1 - 2414 - H - 004 - 061 -

執行期間：91 年 08 月 01 日至 93 年 01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耿曙

成果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 1.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處理方式：即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中 華 民 國 93 年 03 月 31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轉型中的大陸地方政商關係：天橋區的個案研究 1979-2001

計畫編號：NSC 91 - 2414 - H - 004 - 061 -

執行期間：91 年 08 月 01 日至 93 年 01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耿曙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一、中英文摘要

本計劃目的在探討中國大陸的地方政企關係，如何為因應市場衝擊，而逐步展開結構調適的過程。如眾所公認，在過去二十年中，大陸的鄉鎮企業乃帶動經濟成長的主力。而地方政府的配合與支持，則往往被認為是企業發達最主要的關鍵。在許多學者的研究中，此類互動經常被刻畫為「個人間往來」、「親密的糾葛」、「不對等關係」等。此類描繪，多數源於對 80 年代的政企關係，所作的實地考察。但在經歷又十年的市場轉型之後，上述觀察是否仍能準確描繪現今的基層政企關係，實不無疑問。

對此兩派學者提出了不同的預期。有人主張，隨著市場經濟的成熟，在資源的配置方面，政企關係不但退為次要，且其本身亦將經歷深刻的轉變。今日的政企關係，不同於往昔，而以「公務關係」、「淡薄關係」、「對等關係」為原則，而總的方向，則趨近於西方市場社會的一般形態。但許多學者，對此頗不以為然，認為昔日的政企互動模式，既取得相當的成效，理當得到延續，與市場經濟共存共榮。彼等同時認為，此類安排亦將符合大陸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80 年代的互動模式（即「個人式的」、「親密的」、「不對等的」），乃被指為所謂「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核心制度特徵。學者觀點，莫衷一是，雙方論辯，因而持續不已。

本計劃即針對此一主題，展開系統研究，希望能藉由經驗資料的蒐集，對當前中外學界的辯論，提出合理的澄清與解釋。調查的方法則包含計劃主持人的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研究發現 90 年代因結構轉化，將有利政企關係與市場機制的相互調和，增進彼此的效率，共同促成農村經濟的高速發展，故稱之為「創造性轉化」。

關鍵詞：鄉鎮企業、市場轉型、地方政企關係、地方網絡、地方政府

As most China scholars would agree,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and rural enterprises is the key to the explosive expansion of China's TVE sector. In many current studies, such partnership is characterized as "essentially personal," "rather close," and "mostly lopsided." This is most likely true throughout the 1980s and probably still holds in the early 90s. But does this relationship pattern change as China marches towards further marketization? If so, how does it change?

These questions are still under debate among students of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According to some scholars, marketization would eventually undermine such pattern of interactions. Put in another way, the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s in rural China would finally converge to the Western model—their affiliations being less personalistic, less intimate, less clientelistic, and of less significance (in Guthrie's view). But many other China scholars would contest such expectation. According to them, the relationship pattern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and business enterprises as observed in the 80s would turn into the "market equilibrium" (in Wank's words). In light of the idea of "path dependence," they believe these ties would continue to define the "market economy, Chinese style."

This project intends to settle this current debate by collecting empirical data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level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rural China. The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will be based on my extended field trip in a small county (*qu*) in North China. My field research combine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60 rural entrepreneurs and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addition, semi-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will be given to those 60 informants after them being interviewed.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quantitative data analysis and the insights from qualitative information, this project should be able to shed new light on the current understanding on the government-business interactions in rural China.

Keywords: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TVEs), market transition,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s, local networks, local governments

二、緣起、目的與方法

西方對 78 年以降的當代中國研究，多數觸及兩類主題：首先，歷經多年的改革開放，大陸的國家-社會關係，究竟將如何轉變？其次，處於轉型過程中，大陸如何取得傲人的經濟成就？若欲對上述兩類問題，同時加以關照，則大陸「地方層級的政企關係」，應屬極佳切入點。

蓋大陸的經濟增長，公認係起於「基層」。相對於地方控管的集體、私營經濟，大陸高層所屬的國營部門，經濟積效並未見可觀處。因而對大陸經濟成就的解釋，一般仍以基層——尤其鄉鎮企業——的經濟活動為中心。因而若試圖探求「中國奇跡」的制度背景，同樣亦須自其「地方體制」(local regime) 著眼，而基層的政企互動，主導地方資源的流通配置，無疑係其中關鍵環節。

另方面，若意在追蹤市場經濟的影響——特別對國家-社會關係所造成的衝擊，同樣應自基層政企關係入手。其原因有二：首先，基層政府與地方企業兩方，正處於「國家」與「社會」接觸、融會的交界。自此出發，將便於觀察國家-社會關係的變遷移易。其次，基層政府與新興企業，適足以代表「轉型前」與「轉型後」的經濟主體 (agents)，故能反映新舊利益的消長、展現新舊體制的更替。由此可見，大陸地方層級的政企關係，實為極富戰略意義的研究主題。

目下對市場轉型過程中「政企關係」的討論，可大別為兩類理論觀點，一為「市場同化說」，次為「新傳統主義」觀點。「市場同化說」(Market convergence thesis) 主要基於兩項預設。首先，隨市場發育，價格機能將逐步替換計劃或行政配置。而此類機制轉換，既證明有助效率改善，則政府終必自經濟體系中退出，結果則政企互動之必要，必將遠不如昔。另方面，市場擴張，又將牽動政社制度的變遷，一旦處於全新的政經體制下，一則企業家地位將自然提昇，再則舊精英絕難不被淘汰。因而原有的政企互動模式，必將改弦更張，代之而起的政商關係，極可能趨近於西方的市場社會。

對立於前者，則為「新傳統主義」觀點。依此說立論，首先，「國家」處於市場經濟中——尤其轉型期間——未嘗不能扮演正面而積極的角色，市場體系確立，似未必意味「國家」的全面退出。再者，揆諸許多國家的發展經驗，「政商網絡」與市場機制，往往能相互扶持、並行不悖。總而言之，新傳統主義特別強調，切莫低估原有制度調適與開創的可能性。依照此觀點，政企互動，不但不必然泯滅，反將成為極具生命力、創造力的制度環節，構成支撐經濟成長的制度基礎。

上述兩類理論觀點，雖然南轅北轍，但在經驗研究層次，學者間卻取得相當程度的共識。雙方陣營均同意：80年代大陸鄉鎮企業的飛躍發展，主要得力於「混合式的制度安排」。根據學者研究，是類制度安排既非市場主導，亦非政府掌控，而係市場、政府、以及傳統農村社會關係三者的調合。雖然如此，此類「混合式的制度安排」的核心，仍在「基層政府」與「新興企業」間的合作，具體表現則為官員與企業家間密切的「扈從網絡」。上述的「官商聯盟」，一方面有助企業家取得資源、開拓商機；另一方面也有利於政府官員安排富裕地方、表現政績，結果便造成「各種形式的官僚庇護、企業組織掛靠、乾股分紅、轉移集體資產等法外的經濟活動」。如此的制度安排，既承認新興市場的影響，又向舊有國家支配妥協，既符合舊權貴利益，又兼顧合新興階級的需求，乃構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基礎。

對此針對80年代（包括90年代初）鄉鎮企業的研究所得，學者們卻有截然不同的解讀。例如「市場同化說」便強調變化的一面，認為80年代的發現，基本屬於制度演變的「過渡中點」，隨著市場的進一步擴張開放，地方經濟體制將繼續進行蛻變，直到趨近西方市場社會為止。故所謂「80共識」的發現，僅屬過渡期間的制度設計，隨著市場經濟的成熟，彼等必將為時代所淘汰。「新傳統主義」則持相反看法，認為目前的制度安排，乃孕育於特殊時空背景之下，故既能滿足輔助市場交易的需要，又能切合地方權力集團（主要係地方官員與企業家）的利益。地方權力集團既已掌握經濟優勢，將能進一步鞏固其優越地位，終將能長期維繫其身份；因而連綴雙方的「扈從式政企關係」，亦將持續為未來大陸地方經濟的核心制度（Wank, 1999；227-9）。故對新傳統主義而言，在此途徑鎖定（path dependence）的制度演化過程中，市場過渡期間所孕育的政企關係，將持續附著於「中國式資本主義」的發展。

面對此迥異的詮釋，吾人必須瞭解，80年代的經驗調查，實在無法對目前轉型理論的爭辯，發揮釐清的功用。蓋若將社會主義的市場轉型，進一步區分為「市場過渡」階段與「市場成型」階段，則80年代至90年代初，究竟仍屬「市場過渡」階段。而過渡期間的制度安排，是否將在市場體系下繼續活躍，則係吾人所無法確定者。故若試圖預測大陸未來（轉型之後）的地方政經體制，吾人唯有指望90年代進行的經驗研究，蓋其時市場已較成熟，市場體制下穩定的制度安排，已逐漸浮現。基於此，作者乃展開對90年代地方政企關係的實地調查。

因此，本研究主要乃結合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s）與參與觀察。主要

透過訪談問卷，採集有關量化資料，藉以驗證假說，並輔以深度訪談，累積質化資料，以便與前者相互補充。

三、結果與討論

(一)「關係」與其制度背景

本文所謂「關係」，主要指大陸農村社區中，依附於親屬、鄰里、故舊等「個人間持續的個人互動，所形成的網狀聯繫。」由於關係建立在長期穩定的互動之上，具有關係的兩方，必然存在深度的雙向瞭解、相互涉入，而如此的互動模式，不免進而產生「雙方的互控」—任何一方在採取行動時，必須將對方的反應，納入決策的考量。所以「關係」所造成的相互涉入與相互影響，乃「關係」的第一層特性。其次，「關係」由於涉及長期而穩定的往來，不免與複雜的施恩與償付體系交織在一起。結果則「關係」往往被用為相互嫁接資源的利器，此乃「關係」的第二種特性。

關係的運用，必須視其對象而定。中國大陸的鄉鎮企業，就其發展的制度背景而言，基本上處於「國家」與「市場」之間 (Lu 1994; 1997 ; Chen 1995)。兩者既為企業提供必須的各種資源，亦構成企業干預 (政府介入) 與壓力 (市場紀律) 的來源。企業家處於兩者之間，以關係為工具，求取其較大的利益。故在政府方面，企業家通常極力爭取政府的資源注入，但同時又要避免政府的資源汲取；一方面企圖取得政府的支持與保護，另一方面又得防範政府的管制與干預。而在市場方面，則資源的得失，端視競爭的成敗。而市場上的夥伴，相較政府官員而言，所能提供的支持相當有限，雖然如此，彼等卻不致任意的干預經營，造成企業家的困擾。

(二)大陸地方體制的興起與轉化

基於前述「關係」的功能與其所運用的背景，作者將就調查所發現之大陸地方體制變遷，進行簡略的分析。首先，作者以市場發展初期，基層政企聯盟的形成，解釋大陸地方體制的興起。再以市場擴張後，不同企業所各自發展的生存策略，據以觀察地方體制的分化與消解。

80 年代的改革開放，開脫原有的行政束縛，給予農民一定程度的自由，使彼等能夠自主的進行生產，而此種生產當然係以牟利為目的。另一方面，由於計劃體制的配置失調，農村普遍缺乏日常生活的消費品。此一「計劃的缺口」，乃為

簡單的工業生產，創造出巨大的獲利機會。因此，80年代的農村市場，基本屬於供方市場。誰能組織生產，誰便能夠謀取豐厚的經濟利益（楊沐 1994）。另一方面，由於市場化流風所及，農民也同時興起致富的渴望，對發展遲滯社區的地方官員，或多或少造成一些壓力（李培林、王春光 1993）。

面對此市場帶來的機會與壓力，農民回應以如火如荼的組織生產，所謂「家家發火、村村冒煙」。但並非有此企圖者，便能達成目的，工業生產的組織，實有賴「地方聯盟」（local pacts）的形成。此類地方聯盟的關鍵在基層政府官員與鄉鎮企業家。蓋市場萌芽之初，政府幾乎掌控所有資源，若欲發展企業，政府的支援實屬不可或缺——此類支援泛及政治保護、產權確立、資訊提供、資源注入、資金與交易的媒介等等（Wank 1995: 160-6；Keng 2001: Chapter 4）。同時，地方政府也需要企業家出面組織生產，以帶動地方繁榮、創造就業機會、補實地方財政、甚至提供官員的個人消費等。兩者的聯盟，實屬合則兩利。因此80年代大陸農村經濟成功的故事，往往在於當地的工業生產，而工業生產是否能順利推動，則端視該地「政企間的聯盟」能否成功建構。

然而在完成此「地方聯盟」，地方經濟得到初步發展後，隨外在環境的變化，加以聯盟本身的弱點，一旦進入了90年代中期以後，便紛紛面臨日益迫切的挑戰，日漸走向衰頹與瓦解之路。蓋就其外在環境變化而言，大趨勢是：市場逐漸取代政府，成為資源配置的主導機制。企業必須走向市場，以確保資源的來源穩定而不虞匱乏。政府既然不再支配一切資源，政企關係的地位也因此將不復往昔。另一方面，此類「地方聯盟」亦有其內在問題。因為「地方聯盟」實際屬於非正式的契約：政府（以及社區）提供資助，而企業家承諾：在企業發達之後，將回餽地方。但如此的契約，本身卻難以執行，蓋政府付出與企業回報之間，明顯有時間的落差（time lag）。政府在付出資源與提供支持之際，並無法保證企業發達後，將會如約償還地方的付出。事實上，企業在發展之後，的確鮮有願意持續負擔義務者——縱使政府盡力自企業汲取資源以回餽財政、造福地方。

處於此類背景之下，據作者的調查，90年代以來的鄉鎮企業，實際產生了「生存策略」（survival strategy）的分化。蓋各個企業，將依其自身的條件，在市場與政府之間，找尋一條最適合自己企業的路子，以求得較大的利益。因為篇幅的限制，作者在此，僅能將北園調查中所的典型「生存策略」（或可視為企業發展的途徑）。經過了這些年的市場擴張之後，北園的鄉鎮企業，已經自市場孕育初期的「以政企關係為中心」經營模式，走此出了不同的路子，其具體表現便為

「生存策略」的分化。而依企業「生存策略」的不同，彼等亦發展出不同的關係策略，如「市場游擊」類企業，因其多面向大眾市場，且處於完全競爭市場，市場的進入障礙不高，故無法長期依賴政府的保護。而他們多所屬中小企業，政府事實上亦難於監督管制，免除了他們應付政府的苛捐雜稅之類的干擾。故此類企業，往往追求「脫鉤式」的關係，將原有的等級關係，盡數拋棄。

再如「經營模範」型的企業，雖然面向市場，以市場所得為主要的資源來源，但所處市場，多屬寡佔市場，經常需要政府的幫助（例如資金週轉）、保護（例如對外地封鎖市場），以維護其市場上的優勢或壟斷地位。故此類企業，仍須與政府官員維繫密切的互動。但在企業發展過程中，此類企業家將能逐步累積其資源、穩固其地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卻由於發展需要、財政窘迫等的原因，反而必須依賴地方企業的資源。故經過多年發展坐大之後，成功的企業家將能與地方官員平起平坐，其間原有的單向依附，早已不復存在。故此類企業的政企關係的調整方向是為「自我提昇」。以今日北園鎮言，「經營模範」類的企業實構成地方生產與經濟的主力。

其餘則有「公產私納」、「穩固依賴」、「失利退縮」三類企業，主要因其無法適應市場競爭的壓力，或則退回依賴政府資源（「失利退縮」型），或則加強鞏固其原有的依賴（「穩固依賴」型），或則目前重在轉移產權，必須維持其對地方政府的依賴（「公產私納」型），其政企關係，基本上依然故我，並未發生重大的調整。

四、計畫成果與自評

本計畫的經驗研究，係屬精英訪談（elite interviewing）。此類研究的共同限制，在深度、廣度的顧此失彼。作者既注重前者，難免拙於後者；訪談個案有限，不免小樣本的統計問題。但本研究的目的，僅在提列具有啟發意義的假說，待得日後的系統驗證。

在此前提下，根據所蒐集的材料，就本研究所探討的主題，作者得到以下發現。首先，中國農村中的政企關係，在過去二十年裡，無論在角色或結構上，均已經歷相當深刻的轉化。就其經濟角色言，時下的政企關係，多能更有效率的配合與支持市場交易。就其組織結構而言，則展現等級關係式微的趨勢。其次，作者發現，地方政企關係的變化，並非產權所單獨決定，主要應係市場擴張所牽動，且屬企業處於市場競爭的過程中，有意識的自我改造其外部網絡。第三，至於政

企關係轉化的影響，則明顯反映在企業績效上。對今日的企業經營者而言，適時調整其政企關係，改善其外部網絡的功效，相較於但知追求價格優勢，或單憑運用關係手腕，效益往往更為顯著。故依作者所見，此類結構轉化，將有利政企關係與市場機制的相互調和，增進彼此的效率，共同促成農村經濟的高速發展，故稱之為「創造性轉化」。

本文雖專注於華北小鎮的政企關係轉化，對幾個較廣泛的問題，或能有所啟發。首先，作者對政企關係的經濟角色，作了進一步的探索。時下對此主題，所見大相逕庭，或則採取「新古典主義」立場，視政企關係為效率的窒礙，或則主張「發展導向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以其為佔有市場優勢的基礎。唯據作者調查，依賴政商關係的經營模式，雖有其市場優勢，卻可能潛藏病態的傾向。但若經過適當的轉化，則昔日的政企關係，當即化身靈活的交易管道。換言之，政企關係本身難謂資產，必待與市場機制結合，方能貢獻於經濟增長；而政企關係本身並非問題，問題在其最終是否仍為市場效率所服務。

其次，學界對經濟改革的方略，各持所見，聚訟多年；舉其犖犖大者，如 (1) 政經改革，應「次第進行」或「同時推動」(dual transition)？(2) 經改步伐，宜「逐步漸進」或「一步到位」(big bang)？(3) 經濟轉型，應由「市場前導」或「私有化引領」(如波蘭模式)？唯此類宏觀議論，多欠缺相應微觀研究，以為經驗佐證，作者的實地調查，因而值得參考。依作者所見，轉型或發展國家的市場，難以靠本身擴張，便能取得耀眼的經濟積效；反而往往有待政府政策的補充、配合。若既有的政企關係，能與時俱進，逐步與市場機制結合(如北園經驗所示)，則革命性的經濟結構重組(包括替換精英、拆解網絡，若俄羅斯模式)，似非絕對必要；重塑政府效能、再次結締網絡，反將曠日持久，延誤市場經濟的發育。反觀「中國式改革」，以市場逐步擴張，引導政社體制的轉化；政府與市場，相互創造，共存共榮。則無論就政治阻力或經濟績效而言，中國的經改模式，似為較佳方案。

但經濟轉型之外，是否維持舊有網絡，便將阻撓政治、社會的重建？此亦未必。蓋基於作者的調查，市場經濟的步伐，雖或踟躕躊躇，無法撼動原有的政社結構，但隨市場經濟的逐步擴張，終將能變化現有的政社秩序。若先就短期的衝擊分析，則如作者調查所得，中小型企業(採「政企脫鉤」策略者)，既無法依賴政府，又得努力逃避各類需索，往往傾向與政府疏離，將不易扮演推動政治進步的角色。另一方面，較大型的企業，無論其涉入市場的深度，往往仍企盼政府提

供的資源，藉以擴大其市場競爭的優勢（持「地位提昇」策略者）。目前此類企業，將難以承擔政治改革推手的任務。除此之外的「企業家」，更無法投注任何希望。因而，就短期影響言，市場經濟的繁榮，似不必然造成政治變遷的壓力。

但若就長期的影響討論，市場經濟的確立與政企關係的轉型，終將逐步感化原有的政治秩序。此蓋對等合作關係的盛行，有助消解威權主義政體的各類痼疾—如官僚階級、絕對主義、家長威權。而就企業類型細分，則疏離的中小企業，將為維繫獨立於中共政權外的社會力量，累積經濟基礎。另一方面，被整合（co-opt）進入執政聯盟的中大型企業，若其利益有悖於黨政機關，則將能因其談判地位的提昇，對現政權產生較大的節制作用。換言之，市場帶動的政企關係轉化，無疑能為市場社會更開放的政治秩序，奠定較踏實的基礎。

五、文獻參考（因篇幅有限，僅列部分文獻）

- 邊燕杰、丘海雄，「企業的社會資本及其功效」，**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2期（總122），頁87-99
- 陳淳斌，「中國大陸鄉鎮企業輔助與地方政府職能：回顧學界對相關理論的研究」，**中國大陸研究**，44卷，第7期，2001年7月，頁83-103
- 陳俊杰，**關係資源與農民的非農化：浙東越村的實地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8）
- 陳宗勝、吳浙、謝思全等，**中國經濟體制市場化進程**（上海：上海人民，1999）
- 海閻編，**中國鄉鎮企業研究**（北京：中華工商聯合，1997）
- 何夢筆，**網絡：文化與華人社會經濟行為研究**（太原：山西經濟，1996）
- 李培林、王春光，**新社會結構的生長點：鄉鎮企業社會交換論**（濟南：山東人民，1993）
- 林毅夫、蔡訪、李周，**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上海三聯/人民，1994）
- 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歷史**，1996年，四月號，頁72-82
- 劉世定，「佔有制度的三個維度及佔有認定機制」，載**社區研究與社會發展**，潘乃谷、馬戎主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頁1364-1041
- 劉能，**鄉村行政：北園鎮的個案研究**（北京：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未出版博士論文，1998）
- 劉玉照，**非正式佔有的制度化：北園鎮鄉鎮企業的個案研究**（北京：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未出版碩士論文，1999）
- 馬戎、王漢生、劉世定等編，**中國鄉鎮企業的發展歷史與運行機制**（北京：北京大學，1994）
- 邱澤奇，「鄉鎮企業改制與地方威權主義的終結」，**社會學研究**，1999年，第三期，頁82-92
- 孫立平，「改革前後中國國家、民間統治精英及民眾間互動關係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4年，冬季卷，頁37-54
- 吳介民，「中國鄉村快速工業化的制度動力：地方產權體制與非正式私有化」，**台灣政治學刊**，第三期，（1998年12月），頁3-63
- 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台北：正中，1996）
- 周雪光，「西方社會學關於中國組織與制度變遷研究狀況述評」，**社會學研究**，1999年，第4期，

- Boisot, Max. & John Child. "The Iron Law of Fiefs: Bureaucratic Failure and the Problem of Governance in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3: 4 (Dec. 1988), pp. 507-27
- Boisot, Max. & John Child. "From Fiefs to Clans and Network Capitalism: Explaining China's Emerging Economic Order,"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1: 4 (Dec. 1996), pp. 600-28
- Chen, Chih-jou Jay. "Local Institutions and Property Rights Transformation in Southern Fujian," in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Jean C. Oi, & Andrew G. Walder, ed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72-101
- Christiansen, Flemming. & Zhang Junzuo. eds. *Village Inc.: Chinese Rural Society in the 1990s* (Surrey, UK: Curzon, 1998)
- Gore, Lance L. P. "The Communist Legacy in Post-Mao Economic Growth," *China Journal*, No. 41 (Jan. 1999), pp. 25-54
- Grabher, Gernot. & David Stark. eds. *Restructuring Networks in Post-Socialism*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Granovetter, Mark.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in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Mark Granovetter. & Richard Swedberg. eds. (Boulder, CO: Westview, 1985/1992), pp. 53-81
- Guthrie, Douglas. "Between Markets and Politics: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 to Reform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 5 (Mar. 1997), pp. 1258-1304
- Guthrie, Douglas. *Dragon in a Three-Piece Suit: The Emergence of Capitalism in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